

动荡的多党制

——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一瞥

曹瑞涛

摘 要:土耳其共和国的政体在由一党专制向多党民主制的转变过程中,不断激起巨大的社会波动,甚至在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曾先后三次导致军队发动政变干政,社会秩序才得以恢复。当年,土耳其国内有不少人对多党民主制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以为只要有了它,就能够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困难,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然而,作为一种运行逻辑十分复杂的现代政治体制,只有具备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条件后,它才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否则,贸然实行多党制,反而不利于国家稳定 and 经济发展。

关键词:土耳其;多党制;民主政体;政治革新

中图分类号: D521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608(2009)04-0023-06 **收稿日期:** 2009-01-17

作者简介: 曹瑞涛,博士,杭州师范学院政治经济学院讲师 310036

一、一党制的终结

1950年 5月 14日,土耳其共和国大国民议会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选,全国近 90%的选民参加投票,经过公开计票,成立于 1946年的土耳其民主党获得大国民议会中 408个议席,而自土耳其 1923年建国以来一直大权独揽的共和人民党只得到 69个席位,新议会选举民主党党魁杰拉尔·拜亚尔为土耳其第三任总统,民主党主要领导人阿南德·曼德列斯为总理。当共和人民党将政权平稳转交给民主党后,一场由一党专制向多党制转变的政治革命圆满完成。

大选结果公布后,土耳其国内一片狂欢,人们开始尽情发泄数十年来积攒的怨气,“在安卡拉,塔居丁清真寺的一位布道者,在星期五祷告的时候,感谢真主把土耳其从无神论的人民党政府手中解救了出来。在布尔萨附近,一些农民开始去分大农庄的土地,当有人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们回答说:‘现在我们有民主了。’在伊斯坦布尔,出租汽车司机向警察做着土耳其式的表示轻侮的动作,并且拒绝听从他们的指挥……”^{[1]334}

面对此情此景,不太熟悉土耳其历史的人很

可能认为倒台的是个恶贯满盈的独裁政党。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这个由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一手建立并领导的党,不仅把一个任人宰割的“西亚病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还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之恢复健康,骄傲地加入到现代文明国家的行列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土耳其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共和人民党也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

凯末尔担任土耳其第一任总统时期,曾于 1924和 1930年先后两次试图建立起一个反对党,以打破自己领导的共和人民党一党专制的局面。尽管这两次多党制实验都失败了,却表明云集于共和人民党麾下的改革者们并不以一党专制为目标,而是向往着西式的多党民主制。1938年凯末尔逝世后,国内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二任总统伊斯迈特领导的政府开始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1939年 5月,共和人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党政分离的决定,同时废止 1935年共和人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政合一的决议。“二战”爆发后,虽然国家进入战时状态,但随着 1945年 2月土耳其政府对德宣战并签署了《联合国宣

言》土耳其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联系得到加强,国内社会出现较强的亲西方、赞成民主的倾向。“二战”一结束,在1945年11月1日新一届大国民议会开幕典礼上,对于实行多党制,伊斯迈特总统明确表态说:“这是发展我国政治生活的正当途径,而且也是促进民族福利和政治成熟的更带建设性的办法。”^{[1]321}自此,党禁得开,土耳其开始进入多党制时代。

由于共和国成立后的27年间,议会、政府、军队都牢牢控制在共和人民党手里,所有急风暴雨式的社会改革皆由共和人民党一手操办完成,因此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保守、反动势力结下深仇大恨。同时又由于改革无成规可循,诸事摸索尝试,错误政策频繁出现,也引起民众广泛的不满。当这样一个为社会中所有怨恨、仇视和不满所针对的党参加完全意义上的民主竞选,竞争对手又都是些历史清白的新党时,其惨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大选前,许多人觉得,只要共和人民党下台,只要实行多党制,所有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不过,当他们通过民主程序如愿以偿地把共和人民党拉下马后,却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二、民主党的蜕变

民主党一上台,马上执行了一系列与凯末尔时期迥然不同的政策,甚至有些还背离了共和国的立国原则。这些政策主要表现为:经济上激进,政治上反动,从而使国家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遭到破坏,社会生活出现剧烈波动。

在凯末尔时期,经济建设遵循“国家主义”路线,即在不触动私有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奥斯曼帝国,经济极其落后。“有人统计过,当时工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只占10%,而全国85%的工厂又属外国资本所有。由于工业不发达,土耳其人中当时普遍流传着这样一句笑话:‘就是上吊,也得用英国绳子。’”^{[2]143}即便这点家底,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还被冲得七零八落,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溃不成军,经济建设不得不依靠国家之力。再者,土耳其当年的政治口号是“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领袖”。“这种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它必然要将国家的一切领域(包括经济领域)纳入政党和领袖的绝对领

导之下。”^{[2]155}

从1931年提出“国家主义”,到193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土耳其基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得到长足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有所加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产业工人的队伍不断壮大。然而,这些社会新兴阶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主义”反而成了限制他们继续发展的不利因素,所以当民主党一打出“自由经济”的旗帜,立刻得到他们热情的支持。民主党上台后,随即宣布放弃“国家主义”,很多民主党人不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甚至反对制订任何经济计划,“认为经济计划就是对私人经济发展的束缚。民主党政府总理曼德列斯本人就公开声称‘预算就是计划’。他的工业部长则说:‘让我们先干吧,计划嘛,以后再说。’当建筑工程部长法赫里拟定了一份交通、水利建设的五年计划时,曼德列斯竟破口大骂这个计划是以一个‘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3]260-261}

虽然在实行自由经济之初,土耳其经济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局面,尤其在1950—1953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0%以上,可是由于土耳其国内市场先天不足,各种机制极不健全,放弃计划,听任“看不见的手”操作,资金投入多、耗时长、利润低的重工业部门无人问津,轻工业部门则过度发展,造成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同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实力有限,广大农村又没有完全摆脱封建落后状态,城市工业一旦失去国家支持,就只能依靠国外资本,又致使国民经济发展受西方市场左右。因此,这段被称为自由政策的“黄金时期”只维持了3年,之后经济形势越来越糟,国民经济陷入漫长的“黑铁时期”。

在政治生活方面,由于民主党上台时借助了宗教势力,执政后对宗教界的保守势力变得越来越宽容。1950年10月,国家教育部决定把宗教教育列为必修课,同时决定恢复神学院,培养神职人员和宗教教师。1950—1960年间土耳其农村建造了二万多座清真寺,其中一些地方宣礼时又用起了被废止的阿拉伯语。更以为甚的是,一些人开始要求恢复教法和多妻制,重新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当年,共和人民党在推进“世俗主义”时,有些做法的确欠妥,但这都是为了建立政教分离的现代共和国,而民主党的一味宽容甚至放纵的政策,则直接导致政治生活中宗教势力的猛烈

回潮，许多宗教性质的党派组织相继出现，纷纷主张实行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成为未来土耳其政治生活中极不稳定的因素。

与此同时，十分擅长利用民主程序把一个执政党拉下马的民主党却不愿意在自己执政时继续尊重民主精神，反而毫无顾忌地用实实在在的专制来兑现竞选时的“自由许诺”。在野党先后遭到残酷打压，土耳其国民党以利用宗教颠覆共和国为由被取缔，党主席被捕入狱。1955年10月，一些人退出民主党另立“自由党”，反对民主党的执政方案，民主党对这些“叛徒”十分仇恨，伺机报复，如在1958年1月，20名自由党人就仅仅因为集会被送进监狱。共和人民党最倒霉，除组织专用的建筑物和其中的动产以外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收归国有，其机关报《民族报》被勒令停刊，各地的“人民之家”被封闭，甚至党的总书记因发言攻击政府便遭监禁。1960年2月，议会中成立了由民主党议员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享有超越议会和法院的特权，清查所有政治案件，镇压所有反对派，到4月时它又从民主党人控制的议会中获权可以检查一切出版物，封闭报馆，传讯或逮捕任何人，甚至给“可疑分子”判刑……民主党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专制党，引发全社会极大的愤慨。

民主党的统治日趋独裁，经济又越搞越糟，1960年初夏社会陷入动荡无序状态。这时，凯末尔设计的“改革保护器”——土耳其军队——开始发挥作用，5月27日拂晓，军队发动政变，陆军总司令古尔塞勒将军就任临时政府首脑，一切政党活动都被停止，592名民主党议员受到审讯，总理曼德列斯等4人被处以绞刑，461人分别被判以不同期限的监禁，总统拜亚尔等11人被判终身监禁，民主党的统治轰然倒塌。

三、政治与社会的持续动荡

政变军人领导的临时政府为了防止选举产生的议会多数党进行专制统治，决定制定一部新宪法。1961年7月，新宪法由全国公民投票表决通过。1961年宪法把大国民议会由一院改为“共和国参议院”和“国民议院”两院，增设宪法法院。任何人一旦被选为总统，必须脱离所属党派，议员资格也须终止，如是军人还须脱离军籍，任期7年，不得连任。政府总理由总统在大选中获得多

数票的政党领袖中任命，各部部长则由议会提名，再由总统任命，政府内阁成员一律对议会负责。

1961年10月，在国内外的强烈呼声中，军人还政于民，古尔塞勒将军被两院联席会议选为共和国第四任总统。此时，议会里一个大党控制绝对多数席位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参加竞选的14个政党无一获得绝对多数，得票较多的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由于不愿相互妥协，略占优势的共和人民党只能联合一些小党及无党派人士组成联合政府。在缺乏互信与内聚力的情况下，4年内共和人民党三组联合政府，但都匆匆倒台，声望扫地。

1965年土耳其通过了《政党法》，为多党存在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法律保护。是年10月，土耳其议会大选，右倾的正义党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中左的共和人民党，新总理德米雷尔组成正义党内阁，联合政府随即消失。次年3月，总统古尔塞勒病逝，议会选举前土耳其军队总司令杰夫德特·苏奈出任共和国第五任总统，正义党政府与军队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这期间，包括前总统拜亚尔在内的500名前民主党成员根据土耳其大赦法相继出狱，德米雷尔又自觉抵制了正义党内过分西化的倾向，努力营造出一片和解与中庸的政治气氛。

然而，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并未仅仅因为气氛缓和就得以化解。经济方面，1961年宪法在法律上为土耳其确定了混合经济的路线，并在此基础上于1963至1977年间连续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但市场与计划间的争论依然尖锐，在发展经济的基本路线上人们依旧没有取得根本性的共识。政治方面，宗教势力复兴势头猛烈，各类激进主义已开始诉诸行动，社会中恶性暴力事件不断，共和国立国的“世俗主义”、“共和主义”和“平民主义”原则受到严重威胁，由此导致议会中各政党分歧巨大，难于形成良性合作关系。

1971年3月，土耳其国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执政的正义党内部也发生分裂，政府无以为继。为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军方再次干政，总参谋长及陆、海、空三军司令联合致函总统和两院，要求立即建立强而有力、受人信任的超党派政府，并在“凯末尔主义”的原则下进行社会改革。这次军人干政促成了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党的联合，使社会暂时稳定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得以继续执行。

但是,军人的休克疗法并不能根治多党恶性竞争的固疾,之后9年中,政府更迭达11次之多,其中超党派人士组织联合政府6次,每届任期最长不过2年。由于此间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两大党在议会中所得席位都未超过法定组阁的半数,竞选中获得微弱多数的共和人民党总得拉上一些小党才能组成联合政府,“使得它在政府和议会中想作出任何决定和通过任何法律,都要考虑到这些小党派人士的意见,这就形成了在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大党受制于小党的奇特现象”^{[3] 257}。同样,正义党组织联合政府时,也会拉上一些极右翼小党,于是两党都不得不照顾极左、极右翼党派的要求,对其过激行为视而不见,导致各方矛盾激化,恐怖事件直线上升,社会秩序受到极大破坏。

1978—1979年间,西方经济危机致使土耳其国内经济形势恶化,伊朗革命又在土耳其宗教界激起了反世俗化的狂潮,极右翼政府趁机制造教派冲突,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猖獗。当时由埃杰维特领导的共和人民党政府招架不住,只得把权力交给德米雷尔领导的正义党。然而,正义党上台主要依靠一些右翼小党的支持,执政后不但没能有效克服经济危机,反而制定和采取了一些压制民主和工会自由的法令和措施,使整个社会更加动荡。1980年4月,共和国第六任总统法赫里·科鲁蒂尔克7年任期已满,按宪法规定,要由国会两院联席会议选举新总统,经数十次投票,竟无结果,4月7日起,总统职务暂由参议院议长代替,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在此危难时分,以总参谋长凯南·埃夫伦将军为首的军人于1980年9月12日发动军事政变,第三次履行“改革保护器”职责,迅速恢复社会秩序。1982年土耳其通过了共和国的第三部宪法,新宪法强化总统职权,将议会两院制改回一院——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同时,新宪法在第二条中明确规定:“土耳其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非宗教的、社会的法治国家”,第四条规定:“第一条关于国体为共和国的规定,第二条关于共和国特征的规定以及第三条的规定均不得修改,也不得动议修改。”^{[4] 479-480}第六十八条规定:“政党的章程和纲领不得违反国家的领土和民族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原则,不得违反人权、国家主权、民主的和非宗教的共和国原则。”^{[4] 486}

按新宪法临时条款规定,埃夫伦成为共和国第七任总统。1983年军政府还政于民,4月埃夫伦政府颁布《政党法》,开放党禁,这一年5、6月间建立的两个偏右政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成为土耳其新的大党,之后土耳其多党政治进入相对稳定期。不过进入90年代中期后,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西方化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很多人重又转向伊斯兰教以寻求解决办法,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繁荣党因此兴起。

繁荣党“以伊斯兰为旗号,突出宗教和民族意识,反对现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制度,主张严格按照伊斯兰的教义治国,建立伊斯兰式的社会公正秩序。”^{[3] 315}这样一个与宪法精神相悖的党不仅能够建立起来,而且在1995年底的土耳其第20次议会大选中竟赢得550个议席中的158个,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消息一出,轰动世界。虽然繁荣党执政不到一年时间就在各方压力下交出政权,而且因其政教合一政策,在1998年1月16日被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但是从它短暂的辉煌中,还是能够折射出在根本问题上,依旧没有形成深度共识。

1999年4月土耳其举行第21次全国大选,传统大党纷纷失势,一些小党则表现突出,议会中力量愈加分散,政治局面错综复杂。虽然进入新世纪后,土耳其政局显出人心思定之势,但政治改革的成效还是十分有限,许多棘手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通向现代意义上稳定、繁荣的民主共和国的道路依旧漫长而坎坷。

四、对多党民主制的一些反思

土耳其与中国虽然在历史、文化背景上差异甚大,但是自近代以来,两国遭遇相似,救亡图存、自强不息的具体努力方式也不乏相近之处,所以考查土耳其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得失,较之欧美诸国,可能于我们来说更具启发性,尤其通过回首20世纪后半叶土耳其在多党制道路上的艰辛之旅,很多方面颇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民主”作为一种政府决策的方法或程序,其所要贯彻、实行的乃是社会中“多数的意志”,而多党制的出现,又使社会各阶层人们能够更为团结地各自联合起来,有效保卫“少数的权利”,避免多数暴政的发生。可是,想实现“好民主”,仅靠“多党”还远远不够。推进政治民主化,首先要做的不是搞出一大堆政党,弄出一片吵吵

嚷嚷的声音,而是使全体国民在社会最根本方面形成深度共识。

罗尔斯曾把传统社会中提供全面“真理性”原则的教义体系称之为“大全教义”,在他看来,能够进入现代多元文明社会的大全教义在承认与其他大全教义体系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时,应当与其他大全教义体系就不同结论达成相互间的宽容,并在此基础上,于政治平台中主动约束自己,遵守彼此进行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这样的大全教义就是“合情理的大全教义”。与此同时,对于这些社会合作的公平条款来说,它们本身脱离任何大全教义体系,但任何“合情理的大全教义体系”却又可以从自身中找到接受它的理由,从而形成对于这些条款的“重叠共识”。

如果公共政治世界中形成的正义观念正好处于所有“合情理的大全教义”的“重叠共识”之中,那么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就可能形成较稳定的政治平台,于其上人们才能进行各种良性的合作活动^{[5] 10}。当然,就社会正义形成共识只是建设良性政治世界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要形成社会各阶层对宪法的共识,并进一步形成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共识,只有这些共识先行存在,党派斗争的社会成本才会被降到最低,它们间不同的意见也才能在客观上成为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互补性方案。

从土耳其的政治实践来看,由于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并非自身历史演进之果,而是被西方世界卷进的,所以社会内部震荡极为剧烈。当年为了救亡图存,改革者们在短短几年内通过了大量激进措施,无可避免地打乱了人们习惯的生活秩序,更损害了传统社会中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中充斥着不理解、不配合与不服从。在这种矛盾重重、恶性冲突不断的情况下,凯末尔政府只能通过高压统治统一意见。可强行嵌入的东西并不容易被消化,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宗教界许多人士依旧不愿意认可世俗社会的正义理念,许多教派远未转型为“合情理的大全教义”;传统社会中的旧势力仍不愿意全心拥护共和国宪法,总想伺机夺回失去的既得利益;甚至改革阵营中的一些人对“凯末尔六原则”也持有异议,尤其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各方分歧巨大,莫衷一是。

然而,后凯末尔时代的国家领导者忽视了民主制良性运转的先在天性条件,甚至其中许多人患上了“多党崇拜症”,认为只要造出几个对立的政

党,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在这种倒果为因的思路指导下,民主的建设性作用不仅没有发挥出来,反而使社会中多年积怨大面积爆发。在诸党派意见严重分歧的情况下,良性合作无从谈起,政策剧烈波动,国家各项事业无法平稳、有序展开,甚至引致矛盾激化,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

再者,现代民主虽然表现为一种政府决策程序,但仅靠程序并不能保证好民主的实现。除了形成民主之前的共识,社会上下还须认识到在现代民主的精神内核中,“基本假定是个人的价值、尊严和创造力,由此,政府的主要目的在于个人的尽可能的自我导向,而主要手段则是国家尽可能少的强制”^{[6] 374}。形成并坚守这种信念,绝非朝夕之事,亦非自上而下推广能行。托克维尔当年访问美国时,曾敏锐地发现,美国民主扎根在乡镇之中,“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同时他又指出,“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偶然的机会可以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的专制也迟早会重新冒出于表面。”^{[7] 67}

在土耳其,六百年历史的奥斯曼封建军事专制统治,严重破坏了民众的精神世界,尤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根本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到了帝国末年,要求改革的社会精英,虽忙于救亡却疏于启蒙,移植许多制度进来,却忽略了对制度精神内核体认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匆忙搞起来的多党制,五脏俱全只少灵魂,很多政党谙熟民主程序,却根本不尊重民主精神,骨子里仍信奉专制主义那一套。同时,由于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滞后,民众除了观看议员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外,普遍缺乏在切己的生活中自主、自决的训练,从而欠缺民主社会中公民应当具备的才能和美德,即:“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且能理性行事,“为了达成有效的妥协,彼此愿意在个人的与阶级的利益上作出让步”^{[6] 366}。民众的成熟度不高,党派忠诚度也就不会高,结果人们很容易受各种政治势力煽动,立场忽左忽右,致使社会秩序动荡不安,改革成果因此屡遭破坏,而且上台的政党未必兑现诺言,又使民众对民主制度的认识愈加扭曲,对民主的信心也大为损减。由此可见,民主并非一蹴而就的东西,它需要长时间实实在在的

准备,只有基础打扎实了,才会使多党竞争的负作用降至最低,真正推进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伯纳德·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2]肖宪. 沉痾猛药——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黄维民.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 [M]. 北京: 商务

印书馆, 2002

[4]姜士林. 世界宪法全书 [M]. 青岛: 青岛出版社, 1997.

[5] John Rwal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6]卡尔·贝克尔. 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7]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责任编辑: 吴增基)

A Turbulent Multi-Party System : A Glimpse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CAO Ru tao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one party autocracy to multi-party democracy, the Turkish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a continuous turbulence. Only when the army staged a military coup was the social order restored, which took place three time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60s to 1980s. Previously, quite a few people in Turkish society had high expectations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They believed that all kinds of difficulty could be solved by the multi-party democrac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could be guaranteed. However, the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has its own complicated mechanism which will not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until some important social conditions are satisfied. Otherwise, the multi-party democracy may even become an obstacle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Turkey; multi-party system; democracy; political reform

(上接第 22页)

The Further Opening of Hong Lim Park and the
Trend of Singapore'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SUN Jing-feng SUN Pei

Abstract In the early August of 2008, at the National Day Rally, Lee Hsien Loong announced that Singapore's government would open up the space for political expression in order to allow Singaporeans and young netizens to develop a greater sense of political involvement, and designate Hong Lim Park as the site for free outdoor demonstrations to give people more public spac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The further opening of Hong Lim Park should be a good development in Singapore's democratic process. Any Singaporean with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can put forward constructive ideas and views on the various issues about the stat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hich can encourage more Singaporean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Of course, that opening is limited, for demonstration activities are still confined to the Speaker's Corner in the park. The fact that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outdoor demonstration sites somewhat reflects the initiative 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 the Singapore's government has made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from home and abroad. The act of the PAP government has animated Singapore's democratic politics, further improved Singapore's image as an open and cosmopolitan city, strengthened the mediation and feedback of public opinions, and showed a self-confident and friendly image of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 Singapore; Hong Lim Park; democratic politics; trend